

四部古典小说评论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43.25
8722
2

四部古典小说评论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三年·北京

4239658

FF66/08

四部古典小说评论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字数 90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4\frac{3}{4}$ 插页 2

1973年7月北京第1版 197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 10019·2037 定价 0.32元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目 录

评《三国演义》.....	何 磊 (1)
《水浒》的思想和艺术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	(30)
论《西游记》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《论西游记》写作小组	(67)
曹雪芹和《红楼梦》.....	李 希 凡 (99)

评《三国演义》

何 磊

《三国演义》，也称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或《三国志演义》，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，流传极广，影响很大，为人民所熟悉。

一

《三国演义》取材于东汉末年和魏、蜀、吴三国的历史，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(公元 184 年)黄巾起义开始，一直叙写到晋武帝太康元年(公元 280 年)吴亡为止，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。晋朝史学家陈寿把这段历史编成史书《三国志》，南朝宋人裴松之为《三国志》作注，增补了许多材料。东晋习凿齿的《汉晋春秋》，也是一本写三国历史的史书。此后，有关三国的故事一直流传不断。从唐朝李商隐的《骄儿诗》“或谑张飞胡，或笑邓艾吃”，可以看到，当时已用三国人物作为笑谈的材料。宋、元时代，三国人物已由民间艺人搬上舞台或书台，据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北宋“说话人”(即说书人)已是“说话”中的独立科目之一，并出

现了专说“三分”的著名艺人。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国故事的最早写定本，是元代至治年间（公元1321—1323年）的新安虞氏刊刻的《全相三国志平话》，可能就是说话人的底本。《全相三国志平话》共分上中下三卷，从刘秀赏春、司马仲相断狱开篇；正文从桃园结义开始，以诸葛亮病死结束，长达八万多字，虽然叙写简率，但三国故事的始末已粗具梗概。金院本、元杂剧也常常搬演三国故事，现今存留的剧目就有四十多种，剧本有一、二十种。元末明初的《三国演义》就是在上述史书和平话、戏曲的基础上写成的，写作者是罗贯中。“据正史，采小说，证文辞，通好尚”（高儒《百川书志》）的说法，是符合罗贯中写作《三国演义》的实际情况的。

罗贯中的生平不见史传，据一些笔记记载知道，罗贯中名本，贯中是他的字，别号湖海散人，山西太原人（另外还有东原、武林、庐陵等不同说法）；生活在元末明初，大约在1330到1400年期间。他所写的小说很多，相传有数十种，现在留存的，除《三国演义》外，还有《隋唐志传》、《残唐五代史》和《三遂平妖传》等。他亦能词曲。所作的杂剧，现在知道的有《赵太祖龙虎风云会》等三种。从罗贯中所写几种小说的思想倾向看，他推崇“忠”“义”，主张用“王道”“仁政”治理天下。罗贯中一定程度上看到农民起义的某种社会因素，但他所持的态度是错误的，他从根本上否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。他这种政治主张和阶级立场，不仅表现在《三国演义》里，在《隋唐志传》和《三遂平妖传》里也有明显反映。罗贯中写作《三国演义》的时代是元末明初，元封建王朝在

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打击下,彻底崩溃了,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,地主阶级篡夺了农民革命的果实,建立了朱明封建王朝。在农民夺权、地主反夺权的激烈的阶级斗争里,罗贯中的这种政治立场,与当时地主阶级进行反夺权的斗争是适应的,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。

现在可以见到的《三国演义》的最早本子,是明弘治甲寅(公元1494年)序、嘉靖壬午(公元1522年)刊刻的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。全书二百四十卷,分二百四十则,题“晋平阳侯陈寿史传,后学罗本贯中编次”。至于这个刻本与罗贯中原本之间,内容上有无不同,现在没有资料可供说明。在这以后,《三国演义》刊本越来越多,仅明末的刊本,现在可见的就有二十多种,说明流传很广,但在内容上,几乎是大同小异。

清朝初年,毛纶(字声山)、毛宗岗(字序始)父子,假托“古本”,对《三国演义》重新加以修订,并逐回评论。他们在修订中,进一步突出以蜀汉为正统,明确指出,把曹魏定为正统是错误的,而采用朱熹在《通鉴纲目》里关于蜀汉是正统的说法,声称“余故折衷于紫阳《纲目》,而特于《演义》中附正之。”(《读〈三国志〉法》)其次,是推崇关羽,认为关羽“报主之志坚”,“酬恩之义重”,“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”(《读〈三国志〉法》)。毛纶、毛宗岗如此修订《三国演义》,是为了迎合清代统治者的需要。清朝统治者很看重《三国演义》,曾派人同《四书》一起译成满文,并对作为“忠”“义”化身的关羽大加吹捧;同时,为了鼓吹封建伦理观念以维护封

建统治，清代统治者还大肆宣扬封建正统观念，他们不但以标榜“为明复仇”为号召，自居于继明的“正统”，而且还指责曹魏为“篡逆”，否认曹魏为正统。毛氏父子的修订，跟清代统治阶级的观点是正相符合的。此外，毛纶、毛宗岗对文字情节也作了不少改动，如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里所说：“凡所改定，就其序例可见，约举大端，则一曰改，……二曰增，……三曰削，……。其余小节，则一者整顿回目，二者修正文辞，三者削除论赞，四者增删琐事，五者改换诗文而已。”这种修饰加工工作，改变了原本若干松散拖沓的地方，使全书更加紧凑畅达，成为《三国演义》广泛流传的一种本子。毛纶、毛宗岗修订的《三国演义》刊行之后，至今又约三百年了，内容上没有什么大变动。

《三国演义》写作的演变过程，有值得注意的两个特点：第一，它是在集体创作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。作者有民间艺人，也有封建文人，他们的政治、艺术观点和创作意图各有差别，在漫长时期的传说和口头、书面的艺术创作里，集纳和熔铸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内容，所以《三国演义》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思想倾向。第二，它是一部历史小说。三国的人物故事久已流传，为人们所熟悉，这就使创作活动受到某种制约，即不能完全无视原有的三国人物和故事。然而，作者虽不能全盘改变原有的人物和情节，却可以根据自己的世界观来决定取舍，有意识地突出或删去某些方面，进行艺术虚构，利用各种艺术手段来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，等等。所以，《三国演义》并不是简单地复述三国的历史人物

和历史事实,而是一部经过艺术构思和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。它一定程度地描写了封建社会各阶级的阶级关系和生活面貌;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某些罪恶;提供了认识封建社会政治、军事斗争的部分材料;并塑造出一些较有影响的人物形象,在艺术上颇具特色。但是,在封建社会里,地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。封建文人编修的史书,固然是为维护封建制度服务的,即使是民间的、或接近于民间的文艺,也经常受到地主阶级思想不同程度的侵蚀。因此,在民间流行的平话和戏曲,有的封建意识也相当浓重,如《三国志平话》、金元戏曲中的三国戏,封建意识就十分明显。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从维护封建统治立场出发,不但承袭了“正史”和平话、戏曲中的一些封建意识,而且还根据当时封建统治的需要,某些方面有所强化。《三国演义》在鼓吹实施“王道”“仁政”的同时,歌颂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;反对、攻击农民革命;鼓吹“英雄”史观、神权思想和封建迷信;提倡封建道德,特别宣扬“忠”“义”等。因此,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“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,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”的教导,有批判地阅读《三国演义》,把这部小说当作了解我国古代历史的一种思想材料。

二

《三国演义》反映了公元三世纪前后黄巾起义与被镇压的过程,广泛而具体地描写了魏、蜀、吴等封建统治集团内

部斗争,反映了当时某些历史情况。

东汉末年是个土地兼并剧烈、地主剥削残酷、官府徭役繁重、政治腐败不堪的黑暗时代。哪里有压迫,哪里就有反抗。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,迫使农民以武装斗争来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。一场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——黄巾起义,终于在公元184年象一声霹雳,猛烈地爆发了。黄巾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,动摇了它的基础,直接威胁着东汉王朝的生存。地主阶级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,对黄巾起义军进行疯狂屠杀。黄巾起义军虽然在血腥镇压下失败了,但罪恶的东汉王朝也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,无法再维持对全国的统治。地主阶级内部面临着一次新的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。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大小地主武装,为了取代东汉王朝,攫取财产和权力,进行了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和频繁的军事混战。《三国演义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情况。我们可以看到,“四方百姓,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”,声势浩大,“官军望风而靡”,在这种火烧眉毛的情况下,封建统治者一面“火速降诏,令各处预备”(第一回),负隅顽抗;一面调兵遣将,向黄巾起义军反扑过来。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搜罗了大批地主阶级的地方武装,配合“官军”围攻起义军。原先相互争斗着的统治阶级内部各政治派别和军事集团,在维护地主阶级政权的共同目标上,又相互勾结起来,采取联合行动,对起义军进行疯狂镇压。当农民革命归于失败后,官僚豪强间又重新进行混战。汉灵帝死,少帝刘

辩继位，何进掌权，宦官杀何进，袁绍又起兵杀宦官，董卓赶走袁绍，后来又废刘辩而立献帝刘协。各有野心的官僚豪强，朝野呼应，反对董卓。王允设计杀死董卓，而董卓的部属又大杀王允和其他官僚。以袁绍为首的十七镇诸侯，以讨伐董卓为名义，先后割据一方，混战互杀。从镇压黄巾起义中起家的曹操、刘备和孙坚，在多次战争中，一步步扩大势力。曹操自“移驾幸许都”后，使用汉献帝名义发号施令，经过十一年的长期角逐，基本上统一黄河流域，成了割据中原地带的大军阀。赤壁大战以后，决定了曹操、刘备、孙权三国分立的形势。此后，三国之间又混战了七十二年，全国才得到统一。这些大小豪强、军阀，正象鲁迅所描绘的：“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，可以肥己时就肥己，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，可以称尊处就称尊。”（《南腔北调集·沙》）他们为了争夺统治权，今天这几个集团聚集在一起，明天又破裂了；今天那几个集团势不两立地互相混战，明天又杯酒言欢了。《三国演义》有关这种情况的描写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是在不断地进行的。这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。因此，《三国演义》的这种描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封建社会的历史，而且对认识剥削阶级的实质也有所帮助。

《三国演义》在反映这些政治军事集团争权夺利的尖锐斗争时，还描写了一个个政治骗局，一幅幅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的场景。第七十八回写孙权劝曹操做皇帝，就是一个例子。孙权这独霸一方的大豪强，是早在做皇帝梦的野心

家。但当他杀了关羽，吴、蜀联盟破裂，形势不利时，就遣使上书曹操，“伏望”曹操“早正大位，剿灭刘备”，自己愿意“率群下纳土归降”。孙权这种做法是圈套，企图让曹操和刘备之间发生战争，同时，使拥汉派进一步反对曹操，所以这正是陷害曹操的一种手段，正如曹操所说“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！”又如第一〇六回、一〇七回，司马懿夺取曹爽兵权前，以“衰老病笃，死在旦夕”及其他种种假象麻痹曹爽，使曹爽感到“吾无忧矣！”然后发动突然袭击，一下致曹爽于死地。诸如此类的阴谋诡计，在《三国演义》中是屡见不鲜的。其实，这些也正是剥削阶级一贯使用的手法，他们不仅用来对付人民群众，而且也用来对付本阶级的政敌，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本质所决定的。因此，《三国演义》的这些描写，对于我们了解剥削阶级的狡诈手段，识破他们的阴谋诡计，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。

这些大小豪强、军阀，两手都沾满被压迫人民的鲜血，一次次争权夺利的混战，带给人民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。如写董卓：“尝引军出城，行到阳城地方，时当二月，村民社赛，男女皆集。卓命军士围住，尽皆杀之，掠妇女财物，装载车上，悬头千余颗于车下，连轸还都，扬言杀贼大胜而回。”（第四回）董卓由洛阳西迁长安，临行大肆烧掠，使洛阳内外“二三百里，并无鸡犬人烟”。既行，“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，前赴长安。每百姓一队，间军一队，互相拖押，死于沟壑者，不可胜数。又纵军士淫人妻女，夺人粮食，啼哭之声，震动天地。如有行得迟者，背后三千军催督，军手执白刃，于

路杀人。”(第六回)董卓是这样,其他豪强、军阀也何尝不如此!“吾为天下计,岂惜小民哉!”(第六回)最能说明他们共同的阶级立场,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是以残杀人民来建立他们的反动专制统治,以人民群众的血泪和尸骨来维护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的。

然而,作者的描写这一切,并不是为了揭露封建统治的罪恶,恰恰相反,这仅仅是作者用来歌颂“王道”的一种陪衬。所以,他在批判董卓等人的同时,却又通过其“正面”人物来赞扬、美化封建统治阶级,大肆宣扬“王道”。

为了欺骗人民群众,地主阶级一直极力鼓吹“王道”。他们说,“王道”是封建统治的“正道”,实行“王道”的封建统治者是“宽仁爱民”的,人民对这样的统治者则“心悦诚服”。《三国演义》把刘备美化成一个“仁慈”的、备受人民“爱戴”的统治者,也正是把他作为“王道”的化身来进行歌颂的。在写刘备从新野、樊城撤退的那些章节里,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在作者笔下,刘备对人民群众何等关心,为了人民群众,他竟然把自己的安危都置于度外了;至于人民群众对于刘备,更是竭诚“爱戴”,宁可死去,也不愿离开刘备。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刘备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,不但没有丝毫的矛盾对立,而且简直到了共命运、同休戚的地步。这种描写,歪曲了人物的阶级本质,抹煞了阶级矛盾,显然是对于地主阶级的吹捧,对于封建统治的美化,企图使人们去憧憬刘备这样的施行“王道”政治的封建统治者。
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《三国演义》通过刘备鼓吹“王道”

的同时,还把他写成封建王朝的“正统”代表。在汉献帝做皇帝的时候,刘备对汉献帝忠心耿耿,他看到“朝廷陵替,纲纪崩摧,群雄乱国,恶党欺君”,悲愤得“心胆俱裂”(第三十七回),决心“伸大义于天下”(第三十八回),为重整汉王朝而奋斗。当汉献帝被废以后,刘备在四川做了皇帝,以继汉统,作者就把蜀汉作为三国的“正统”。而对于董卓、曹操之流,作品则一再斥责他们为违反“纲纪”、破坏“正统”的“乱臣贼子”,所谓“名虽汉相,实为汉贼”。这就是说,封建王朝的“正统”、封建制度(即所谓“纲纪”)的忠实维护者,就是“仁慈爱民”、实行“王道”的人,而人民的灾难,则是由“乱臣贼子”破坏封建“纲纪”所造成的;所以就封建统治的本质来说,是保护人民、跟人民利益相一致的。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,《三国演义》作者批判董卓、曹操等人物,跟他的歌颂“正统”、鼓吹“王道”一样,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。

也正是从这种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,《三国演义》对农民革命直接进行了诬蔑。小说所写的黄巾军,是汉末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运动。毛主席在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》中深刻指出:“在中国封建社会里,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、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,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。”但作者却一再诬蔑他们是“黄巾贼”,并通过小说中所谓“正面”人物之口,公然主张把农民起义军斩尽杀绝,“若容其降,无以劝善”(第二回),反对农民革命的态度,十分坚决,十分鲜明。但在这里,却也就同时暴露了“王道”的虚伪性。正如鲁迅所指出,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,“其实是

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”（《且介亭杂文·关于中国的两件事》）。封建统治阶级吹嘘的什么“仁慈爱民”、“广布恩德”，全都不过是欺骗人民、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虚伪口号，在这些口号的背后，是对人民群众极端残酷的屠杀和迫害。大肆宣扬“王道”“仁政”的《三国演义》，同时却又公然主张把起义人民斩尽杀绝，这也就有力地说明了“王道”的反动实质。

总之，《三国演义》虽然为我们提供了若干对于封建社会的历史具有认识意义的材料，但却宣扬“王道”、鼓吹“正统”、反对农民起义。所以，我们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进行分析批判，剔除它的封建性糟粕，明确认识作品所歌颂的“王道”、“仁政”完全是对人民群众的欺骗，同时也要看到，作品中的所谓“乱臣贼子”正是地主阶级的代表、封建统治的体现者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从《三国演义》的有关材料中看到：在黄巾起义被镇压以后，社会生产力遭受空前大破坏，人民大量地被屠杀，地主和农民这两个对立的阶级过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。人民生活在饥寒交迫、水深火热之中，“百姓皆食枣菜，饿殍遍野”（第十三回）。而以董卓之流为代表的地主阶级，则过着奢侈豪华、纵欲无度的生活，“宫室仓库，屯积二十年粮食。选民间少年美女八百人实其中。金玉、彩帛、珍珠堆积不知其数”（第八回），形成两个阶级鲜明的对比。这也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封建社会的罪恶，认识到农民起义被镇压以后，地主阶级对人民决不会实行什么让步政策，而是更加疯狂地进行榨取和迫害。

三

“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。”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真理。然而，剥削阶级却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事实，把历史说成是少数剥削阶级的“英雄”人物所创造的，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也同样如此。作品所着重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——刘备和曹操，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对立的人物，如刘备告诉庞统所说：“操以急，吾以宽；操以暴，吾以仁；操以谄，吾以忠；每与操相反。”（第六十回）作者正以强烈的“拥刘反曹”的政治倾向，描写在同一事件上曹、刘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，这种描写充满全书。然而，无论是赞扬还是鞭笞，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，作者都宣扬了“英雄”史观。

《三国演义》把刘备描写为一个理想化的统治者、施行“王道”“仁政”的代表，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，被大量虚声美词掩盖着。《三国演义》否定黄巾起义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，而那些残酷镇压黄巾起义、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封建统治者，却被当作历史的创造者来吹捧。在陶谦把徐州让给刘备而刘备固辞不受时，作者安排了这样的情节：“次日，徐州百姓，拥挤府前哭拜曰：‘刘使君若不领此郡，我等皆不能安生矣！’”（第十二回）在刘备军队于博望坡大破曹兵，“班师回新野”时，作者又安排了这样的情节：“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，曰：‘吾属生全，皆使君得贤人之力

也。’”(第三十九回)在这种颠倒历史的描写中,封建统治者刘备就成了救世主。为了表现刘备如何受到人民拥护,竟写了猎人刘安杀妻献肉这样的情节。刘备兵败徐州时,人民“皆争进饮食”,猎户刘安“欲寻野味供食,一时不能得,乃杀其妻以食之”(第十九回)。这种不真实的对地主阶级的吹捧,加重了刘备形象的虚伪性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指出:“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”,是最切当的批评。作为刘备对立面的曹操,却是《三国演义》描写相当突出的人物。

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诗人。他奉行法家思想,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,曾起过相当的作用。《三国演义》把他作为破坏“正统”、违反“纲纪”的乱世奸雄来否定,这反映了作者的儒家政治观点。从研究历史的角度来看,这并不是对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。然而,作为文学作品的《三国演义》,曹操的人物形象却反映了统治阶级残酷、狡诈的特点,成为一个著名的典型形象。

曹操也是农民起义的死敌,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刽子手,他在豪强大混战的过程中,一步步扩大势力,最后取得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地位和权势。曹操的人生哲学是“宁教我负天下人,休教天下人负我”,这是剥削阶级处世哲学的集中和概括。曹操具有极端的损人利己的特性,具有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,曹操身上,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全部恶劣品质。对于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,《三国演义》是通过丰富具体的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写,把他突显出来的。在他身上,具有多方面的复杂的性格特征。作为一个群雄